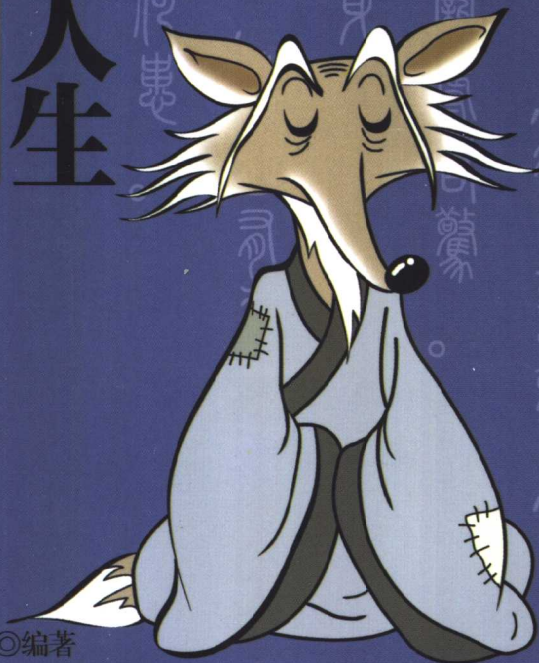


淡泊

老子

人生

史家说，不读历史，不能知兴替！
老狐狸说，不读历史故事，不能知



王永成◎编著

前言

老子是一个谜，一个千古难解之谜。

多少年来，史学界一直试图撩开蒙在老子脸上的神秘面纱，但至今连其真实名字也不能肯定。特别是老子成为道教的教主——太上老君后，更是神秘莫测。

《神仙传》说：老子在其母腹中整整七十二年才出生，一落地便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了。——这自然是将老子神化了，因而不足为信。

然而，就是治学严谨的司马迁，在其“千古绝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谈及老子时，也不得不用模糊的手法，让人对老子若明若暗：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之藏室之史也。

如果太史公继续深入下去，也许会让后人一睹老子之真容。但行笔至此，司马迁却笔锋一转，讲起了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稍后，也只能推测：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一个“盖”，再加上一个“或”，让读者只能自己去想了。

事实上，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为老子生活的年代而争

论不休。有人认为老子在孔子前,有人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后,也有人认为老子在庄子之后,更有人认为老子是汉初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比较可信的,应该是老子稍早于孔子。因为,在先秦的典籍中如《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及《墨子》佚文中,都没有怀疑过老子其人以及与其学说的关系,上述这些不同的学说,都从不同的角度描绘着一个思想面貌大致相同的老子,而且,他们所描绘的老子学说,与《老子》(即《道德经》)一书的基本思想也是相符的。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战国中期以后,诸子受到老子影响之深,几乎很容易能从其著作中看到老子学说的影子。只是到了汉初,才开始把老聃、李耳及太史儋的关系弄混,以致时代相差两百多年。这样一来,老子其人也变得模糊起来。

老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且不说道教将其神化,奉为祖师,就是历代帝王,也崇奉有加,初立庙祠,后又专设道宫,加号册封。东汉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年),桓帝派遣中常侍管霸到苦县祠老子,次年又亲祠老子于濯龙宫,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乐。到唐代,对老子更加崇奉。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便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史”,奉老子为祖先。高宗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年),则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虽然武则天曾试图用佛教削弱老子及其道教的影响,却未能奏效。后来的玄宗,又于天宝年间一再加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于西京、亳州升设太清宫。宋真宗为避宋室圣祖赵玄朗

讳,改称老子“真元皇帝”,次年亲至亳州真源县朝谒太清宫,奉上册宝。此封号在道教中沿用至今。纵观中国历史,一个人死后能得到如此之殊荣,除老子,似乎再无他人。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老子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老子的著作更是让后人着迷。《老子》只有区区五千言,但历年来研究《老子》的著作则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大陆近十年内发表的老子专题论文就有近三百篇(部)。而对《老子》的看法,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怎么认为,有一点几乎是所有学者公认的:即老子对中国的政治的影响是深层而无形的。虽然历史上明确以黄老为治者只有汉初,其后历代王朝在名义上均尊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但事实上却都离不开老子,不能不让老学作为礼教的补充,所以有“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之说。如果说中国政治家的成熟,赖儒学薰陶而有事业心,那么,其斗争艺术则有赖于老学和道家的智慧。

《老子》连同后来形成的道家思想,是一个多层次的不断演化和繁衍的动态体系,因而也是一个可以从多层面不断挖掘的宝藏,正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本书中,虽然作者试图从治国、用兵、谋事、人生等方面,对《老子》作了一些探讨,但也只能是触及皮毛。相信有兴趣的读者,仔细研读《老子》原著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目 录

前言	1
一、谋事篇	1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2
以静制动	7
大巧若拙	13
退其身,而身先	17
清静为天下正	22
图难于其易	27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33
二、用兵篇	41
不以兵强于天下	42
善战者果而已矣	44
恬淡为上	49
以奇用兵	52
以退为进	57
善胜敌者,不争	59
哀兵必胜	64
三、治国篇	71
治大国,若烹小鲜	72

不尚贤	76
爱民治国	80
取信于民	83
执大象,天下往	87
以百姓之心为心	91
不循道则自毙	94
治人事天,莫若嗇	97
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100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08
海纳百川,其善下之	113
大邦不过欲兼蓄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	118
四、人生篇	121
宠辱不惊	122
功成而弗居	127
善利万物而不争	130
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133
返朴归真	140
自知者明	144
自胜者强	150
大器晚成	154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157
五、思辨篇	163
有与无	164
强与弱	167
美与丑	170

祸与福	173
生与死	175
动与静	180

一、谋事篇

老子的学说常常使人困惑，也常常令人误解。

比如，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因此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而事实上，老子的思想本身就充满智慧，难道说“大伪”由此而生？

也许，老子的魅力正在于此。不管他如何主张和抛弃那些聪明智巧，但他所揭示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恰恰成为人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所倡导的清静无为，也正是聪明智巧的最高境界，正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注入更多的精力去领会《老子》的精神实质，而不应该将其简单化、实用化。只有这样，才不违《老子》之初衷。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老子·第二十四章》

这里,老子用“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作比喻,说明“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后果都是不好的,不足取的。这些轻浮、急躁的举动都是反自然的,短暂而不能持久。因此急躁冒进,自我炫耀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踮起脚跟想要站得高,反而站立不住;迈起大步想要前进得快,反而不能远行。自逞己见的反而得不到彰明;自以为是的反而得不到显昭;自我夸耀的反而建不起功勋;自高自大者反而不能博采众长。从道的角度看,以上这些急躁炫耀行为,只能说是剩饭赘瘤,是令人厌恶的东西。所以有“道”的人绝不这样做。

在这里,老子阐述的问题,仍然是社会政治及其得失的问题,同时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诸如“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不明”等等,这些表现及其结果往往是对立的、相互矛盾的。这是老子思想中极富精义的部分。

争夺皇权的斗争，历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稍有不慎，便会鱼死网破。所以，最后能夺得皇位者，莫不隐忍待机，否则，操之过急，只能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唐太宗李世民在通往皇权路上的拼杀中，就是因为能够耐心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后，就迅速行动，一举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唐高祖李渊统一天下以后，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之间，便开始了皇位继承权之争。当时，李建成以嫡长子被立为皇太子，取得了传统的合法地位并得到陇西士族势力的支持，他长期留守关中，在政治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到宫中妃嫔和贵族的拥戴。他手下有魏征等文臣，又有冯立等武将，还招募四方勇士二千余人守卫东宫。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被封为秦王），但从最初的谋划起兵，到统一天下，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大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长期的征战，使他手下人才济济。秦王府中，既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威名赫赫的骁将，又有房玄龄、杜如晦等足智多谋的文士。他们都希望秦王李世明取代李建成，立为太子。

一场权力之争已不可避免。李世民早已看到，自己处于这场斗争的漩涡之中，或是鱼死，或是网破，已是身不由己。但时机尚未成熟，不能

轻举妄动。为了保存自己,防止意外变故发生,便预先安排一条退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东都洛阳殷实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李世民的力量主要集中于此。为慎重起见,李世民派大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秦王府车骑将军荥阳人张贤亮率一千多人回到家乡,在洛阳协助温大雅,暗中结纳当地豪杰,积蓄力量,以备不测。李世民又交给他们大量金银布帛,由他们随意使用。

李元吉向李渊诬告张贤亮图谋不轨,当官府审讯时,张贤亮一言不发,只得无罪释放。张贤亮回到洛阳后,继续为李世民筹备力量。建成、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夜里,建成假意召李世民饮酒,暗中在酒中下毒,李世民险些丧命。李渊自然知道原委,但他不希望兄弟间公开对立,于是便假装糊涂,责骂建成说:“秦王平时不能饮酒,你们以后不许夜饮了。”又对李世民说:“从谋划起兵到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从前我想立你为皇嗣,但你百般推却。如今建成长大了,做太子也很长时间了,我不忍废掉。但你们兄弟好像不相容,同在京城,必然会起纷争,我想让你回到行台任上,驻守洛阳,从陕西以东,归你节制,你可以打起天子的旗号,就像汉景帝赐封梁效王一样。”李世民非常伤心,一再哭着说不愿离开父皇。李渊说:“天下都是我们李家的天

下,东西两都,相距不远,我想你的时候,说去就去了,你不要过于悲伤。”

建成、元吉感到:世民一旦到了洛阳,占据地盘,积蓄力量,再想约束他,就不容易了。不如留他于长安,困于无援之地,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施展。于是暗地联络几个大臣,密奏李渊,声言“秦王部下听说去洛阳,高兴得连蹦带跳,看样子,恐怕再不想回长安了。”随后,又派亲近李渊的大臣陈说利害,终于使李渊改变了主意。

对太子与齐王的一再挑衅;李世民处处退让,让人觉得他真的是虎落平川,软弱可欺。其实他表面上怯懦,正是为了掩盖深远的计谋。建成、元吉必欲置李世民于死地而后快,串通后宫妃嫔,不断吹枕边风,诬陷李世民。偏偏李渊又是耳软之人,偏听偏信,竟想治李世民的罪。幸好关键时刻大臣陈叔达进谏说:“秦王有大功于天下,千万不能随意处治,况且他生性刚强,如无故贬损,怕受不了忧愤的折磨,也许会染重病,到时陛下就后悔莫及了。”李渊这才回心转意。

李渊也感到秦王李世民功高盖主,难以驾驭。只是李渊为人远比元吉深沉,对杀秦王的做法,并不赞同。政治风云诡谲莫测,秦王府人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李世民的心情并不比别人轻松,凭着自己征战多年带出的文臣武将,本可与建成、元吉一决雌雄。但是,政治斗争需要耐

心，需要等待时机，否则，“欲速则不达”。

但李世民的一些谋士却感到应该早日下手。房玄龄对李世民的妻舅长孙无忌说：“现在仇怨已经结下，一旦祸乱突发，岂止秦王府玉石俱焚，这实在是国家的灾难。不如劝秦王效法古人，就像周公诛杀官叔、蔡叔一样，诛杀太子，以确保大唐江山的稳固。生死关头不容迟疑，应该立即动手。”长孙无忌很赞同房玄龄的意见：“我有此想法已久，只是未敢言明。如今先生的话，正合我意。应该明告秦王。”于是，赶紧前去禀告李世民。李世民把房玄龄也召来，共同商议。房玄龄说：“大王功高盖世理应继承皇位。别看现在情形危急，其实这是上天在逼你这样做，请大王切勿犹豫。”于是和秦王府幕僚杜如晦一道，极力劝说李世民，要他早下决心，诛除建成、元吉。

就在建成、元吉收买、排挤秦王府部将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察觉到，李世民已成功地结纳了太子的心腹部将何常及其府中的属官王晔等人，他们作为秦王的间谍，在政变的关键时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至此，李世民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了。

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六月四日，长孙无忌等人随李世民潜入禁宫。这天玄武门守将正是何常。李世民与部将得以顺利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对此毫无察觉。他与元吉走到临湖殿，才觉

得不对，立即拨转马头，想赶回东宫搬兵。李世民率众追杀，取下了建成、元吉的首级。“玄武门之变”很快结束。

六天后，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同年八月，高祖退位，李世民登基继位，称唐太宗。次年，改年号为贞观。

李世民取得“玄武门之变”胜利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李世民沉稳持重，耐心等待时机，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试想一下，在李建成已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齐王元吉又咄咄逼人时，李世民如果操之过急，不待时机成熟而过早下手，毫无疑问，李世民成功的希望将是非常渺茫的。

以静制动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辘重，虽有荣观，宴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老子·第二十六章》

老子觉得，作为一国之君，稳妥地治理国家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厚重是轻率的根本，静定是躁动的主宰。因

此君子终日行走，不离开带篷壁的车辆，虽然有美食胜景吸引着他，却能安然处之。为什么大国的君主，还要轻率躁动治天下呢？轻率就会失去根本；急躁就会丧失主导。

老子认为，轻与重、动与静这两对矛盾中，重、静是根本，轻、动其次。老子在这里讲的辩证法是为其政治观点服务的，他的矛头是指向“万乘之主”，即大国国君的，认为他们奢侈轻淫，纵欲自残，即用轻率的举动来治理天下。在老子看来，一国的统治者，就当静、重，而不应轻、躁，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地治理自己的国家。虽然老子在动与静的关系的认识上并非很准确，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动与静的矛盾，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但这并不妨碍老子要说明的观点，即：一国之君，应当“静”、“重”，而不能轻浮躁动，这样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

治理国家是这样，夺取国家最高统治权力也同样是这样。明太祖朱元璋就很懂得这个道理。他采用的著名的大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中的“缓称王”，就含有以静制动的思想。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大战略出自于儒士朱升之口。朱元璋本人读书不多，许多道理也说不明白，但值得称道的是，他每占领一个新的地方，必定访求当地的儒士，被相中者非请来不可，且软硬兼施，真可谓求儒士而“不择手段”了。就是这个朱升，当面为朱元璋谋划了一个大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闻之大

喜，全盘采纳了这个大战略。

朱升提出“缓称王”时，当时主要的几路起义军和较大的诸侯割据势力中，除四川的明玉珍、浙东的方国珍外，其余领袖皆已称王、称帝。最早是徐寿辉，在彭莹玉等人的拥立下，于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一三五一年）称帝，国号天完。张士诚在元至正十三年（公元一三五三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刘福通因韩山童被害，韩林儿下落不明之故，起兵数年后未立“天子”，到元至正十五年（公元一三五五年）觅得韩林儿，即拜为皇帝，建国号宋。元至正二十年（公元一三六〇年）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四川明玉珍闻讯，亦自立为陇蜀王。

相比之下，实力并不算弱的朱元璋称王最晚，直到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一三六四年）才自立为王，建百官。这是他坚定采纳“缓称王”建议的结果。朱元璋成为一路起义军的领袖，是元至正十五年（公元一三五五年）的事情，到称吴王，时隔九年之久。即使从朱升提出“缓称王”的建议算起，也有七年之多。至于称帝，则是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一三六八年）的事情了。

“缓称王”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独立反元的政治色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元王朝对己方的关注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以及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性，在

其他起义军与元军正面交锋的过程中，“静”观事态发展，从而有利于保存自己的势力，积蓄实力，求得稳步发展。

在天下大乱的封建朝代，起兵割据并不意味着与中央朝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是割据势力一旦推出个什么王或帝，打出个什么国号来，那就标志着这股势力与中央朝廷分庭抗礼了。任何一个王朝对此都非常敏感，哪里有自立的王或帝，必定派大军前往镇压。元王朝当然也是如此。徐寿辉称帝的第二年，元朝大军就对天完政权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天完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彭莹玉就是在保卫杭州的战斗中牺牲的。同样，张士诚称王、建国号大周的第二年，元朝以丞相脱脱为主帅，统大军进攻高邮，兵围六合，大败张士诚。而刘福通迎立小明王仅仅十个月，元将答失八鲁率大军进攻宋政权，刘福通大败而逃；元军又进围宋政权的国都亳州（今安徽亳县），小明王只得奔安丰。宋政权虽在以后的几年里曾有过巨大的发展，但由于它是元军注意的焦点，从元至正十五年（公元一三五五年）至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一三六三年）的八年间，元王朝的主力军队一直缠住宋政权的红巾军不放，致使刘福通战死，红巾军主力被歼，小明王从此一蹶不振，只能靠朱元璋的庇护过日子。

一直到朱元璋大举北伐南征时，朱元璋的这